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从文本到行动

—— 保尔·利科传

[法国] 蒙甘 著

刘自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 名:从文本到行动——保尔·利科传

著作责任者:[法]蒙甘 著 刘自强 译

责任编辑:张冰

标准书号:ISBN 7-301-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印张 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元

传 略

保尔·利科于 1913 年 2 月 27 日生于法国南方城市瓦朗斯。早年父母双亡：他出生六个月后，母亲去世。他的父亲任英语教师，1915 年阵亡于前线。

大战开始后，他与姐姐由祖父母照料，一位未婚的姑母将他们抚养成人，并终生伴随他们。保尔·利科成为了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他就读于雷恩城的中学。在哲学班上，受到教师罗朗·达尔比耶决定性的影响，踏上成为哲学家的道路。青少年时代，他深感到《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性，这是他和平主义感情的起源。艾玛纽埃尔·穆尼埃与既是神学家，又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安德雷·菲力普相继对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至 30 年代。

入雷恩大学后，他的硕士论文以法国反思哲学的两位代表拉施利耶与拉缪为研究对象。以后他入巴黎大学继续学习。在巴黎，他坚持不懈地参加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星期五晚会”。在晚会的讨论中，他开始认识胡塞尔的著作。这段时期，利科的家庭屡遭哀伤的丧事。他相继失去抚养他的祖父母，而更残酷的打击是：他的姐姐在 23 岁时死于肺病。1935 年，他通过了中学哲

学教师学衔的考试，并与童年时代的女友西蒙娜·勒雅结婚。1935年秋天，他往东部的科尔玛城教书，后来又赴大西洋沿岸的洛里扬城执教。

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时，他在慕尼黑大学的暑期班进修德语。回法国后，他应征入伍，并在法国的战役中被俘，囚禁于德国纳粹在波兰的波梅拉尼各处的军官集中营，直至1945年战争结束。这些艰苦的年代对于他却是一段卓有成效的时期。他阅读了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后来他与友人米凯尔·迪弗雷恩合作出版了论雅斯贝尔斯的首部作品），同时，他翻译了胡塞尔的《观念 I》；而且，这位本性难移的教师还为他的同狱囚犯讲授哲学课。

利科被释后，前往利尼翁河上的尚邦城的塞文地区中学教书（1945 - 1948）。这小城的居民大部分是新教徒，在大战时期曾因积极救助犹太人而闻名。同时，利科被任命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这段时期，他与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莫里斯·梅洛-庞蒂以及让-保尔·萨特同样为传播德国的现象学作出了贡献。他继续研究并翻译胡塞尔与黑格尔，由于黑格尔，也由于埃里克·韦尔的功劳，他产生了严格的政治要求与国家意识。这将是他一贯保持不变的特征，甚至在1968年以及以后的年代中。

1948年，他接替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译者让·伊波利特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史专座教授。早在1950年，他通过了论意志的现象学论文，并不断为《社会性

的基督教》杂志撰写许多文章，同时也在《精神》杂志发挥主要作用。60年代初，他在这家杂志主持哲学组，正是从这哲学组的活动中出现了与列维-施特劳斯的著名讨论。

1956年，他登上巴黎大学在贝耶尔去世后所空下的专座教授讲座，并迁入夏特内-玛拉布里的白墙内。他在此遇到了宝莱特·穆尼埃，保尔与西蒙娜·弗雷斯，尼科尔与让-玛莉·多姆纳克以及马鲁夫妇。利科因意识到学校当局的不安，于1965年自愿去农泰尔（巴黎十大）教书。后来，西尔万·扎克、亨利·迪梅里、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也相继而至。1969年3月，他被选任校长。一年后，他于1970年因受一次人身侵犯而辞职（1），但更是由于受当时突然转向左倾的大学界一部分人士的排斥。

由于对法国知识界生活采取“不由自主的”距离，利科赴比利时卢汶大学任教，那时卢汶的哲学系尚未在地理上划分为新卢汶与勒旺两地。三年后，他再回到巴黎十大，并在此结束了他在法国的教书生涯。与此同时，他赴大西洋彼岸执教，首先是受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邀请，继而受他在尚邦时期认识的公谊会社区主持的美国学院以及耶鲁大学的邀请。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作过几次长期逗留，因他曾几次与米尔萨·埃利雅德分担一门课程，直至1990年他仍前往芝加哥大学。

（1）有关这次人身侵犯的小故事是：曾将字纸篓套在利科头上的农泰尔学生20年后，在通过论文时来向利科道歉。

这些年代对他颇有效益。他得以完成长期以来着手的法国反思思想、德国哲学以及英国哲学之间的“三角对话”——德国哲学应按其多样性理解：首先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以及哈贝马斯的联络行动的理论。这导致几部著作的连续出版：《活的隐喻》，《时间与叙事》三部曲，以及《犹如他人的自我》。这些著作在《哲学秩序》丛书中出版，这套丛书是1966年他与弗朗斯瓦·瓦尔在色伊出版社创立的。这使他能够出版英国的分析性思想的传统的代表人物，也能出版某些法国与德国作家，如让·格勒尼埃，米歇尔·菲利贝尔，H. G 伽达默尔等。

《时间与叙事》与《从文本到行动》相继出版后，他获得了在法国应享有的承认与公众的兴趣，而在这块土地上，当他主持位于帕尔芒蒂耶街上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研究中心时，（与他共事的人有多里扬·蒂弗诺，弗朗斯娃兹·达斯蒂尔等），当他在1974年再担负起继续让·瓦尔对《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的领导时，（他一直是该杂志的主任，身边有由弗朗索瓦·阿祖维与马克·B. 德·洛内组成的年轻班子），并当他保持与《精神》杂志的亲近时（其他与新教团体有关系的喉舌报刊就不用多提了），他却反常地停止存在。

虽然他经受到一次可能留下深刻痕迹的家庭悲剧，但利科以极大的平静恢复了在法国社会与知识界的生活，成为今天社会与知识界的领导之一。事实上：巴黎大学（农泰尔分校）与1968年5月革命相继引起的创伤以及在

法国与结构主义的流产的辩论曾太久地使他处于法国舞台的一旁，正如他的朋友勒维纳斯一样，他在自己的祖国受到姗姗来迟的承认。这与国外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今天他是世界上九所外国学院的院士，31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导言 面对怀疑主义

迟缓的承认

60年代末与整个70年代期间，保尔·利科被排斥在法国的知识界生活之外，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受到公众的承认——他的情况与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极其相似，自从他们各自致力于将现象学的思想介绍到法国来后，两人不断交错而过。公众对利科的承认与前一段时期形成奇特的反差，但是这种承认带有误解的色彩。误解的原因大部分出于法国知识界思想的左右摇摆，但是一贯的原因则也由于利科（本人特有）的工作风格与节奏。

在此勿庸强调法国“知识界立场”的反复变化。在这个国家，时髦与激情可以瞬息从一种态度转向另一种态度，从一种立场滑向其反面是易如反掌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赞扬与认可并非消除误解及任意判断的最佳保证。利科与勒维纳斯有所不同，他并不能随时防范人们仓促的阅读，于是在来自“反人道主义”意识的遣责面前，他极易受到攻击。

在此出现的反常现象是：今天利科好像是当代恢复

人道主义大潮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可是他从未给予这个意义含糊的词汇以最低的信誉。如果说他重返公共生活的舞台是适逢社会对人道主义的认同时机，以及伦理或道德的再现（这是两个人们任意混淆的词汇），那么这一重返就可能引起混淆。

同时，利科的著作也具有某些内在难点，不易作出协调一致的解释，几乎不易达到一种如在勒维纳斯的著作中那样的总体看法。

勒维纳斯已使某些深入阐明其哲理的作品产生。阅读利科的著作却不能不遇到意外的节奏变化，不易追随的地理位置的改变，而他在继“解释学”时期之后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哲学，是作为以法国及日尔曼的欧洲大陆思想为一方，以英美分析哲学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对照，这种对照将使他的许多忠实读者不能不感到困惑。

自《活的隐喻》，《时间与叙事》三部曲及《犹如他人的自我》发表以来，利科出版的作品使以前曾欣赏过其收入在《历史与真理》或《解释的冲突》中的文章的读者畏缩不前。因此许多读者产生了共同印象：利科的写作已变得有更多学术气味，要求以后的读者更具备对当代哲学产品的预先知识。

这种感情虽然合乎情理，但仍应加以细微的区分：利科的短文常常汇集成大部头著作，发表在《解释的冲突》一书中的文章，其严谨与厚实并不亚于《时间与叙事》的严肃性。再者，对利科的著作愈趋厚实的印象极其似是而非，既然人们同时承认“大学学究”的利科

——这曾是欢呼 1991 年《释读集 I》的发表所用的一个重复出现的固定词句——并未放弃干预公众空间，无论他自己的说法如何，他也同样对民主国家或南半球国家以及自然环境深感忧虑。这一印象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许多哲学工作者继续含沙射影地责备利科是一个释读者，而不是一个新颖概念的创造者，当他们在利科的著作中不能狡诈地看到某种隐蔽着的神学时。

自他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引起论战以来，利科成为四重怀疑的对象，他被视为迂夫子、大学学究、人文主义者或信徒一类的人物。一贯对其平生经历不加宣扬的利科为此常不能掩饰他的失望。他不无理由地感到 68 年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有关人道主义的争吵——双重地受到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及激进思想的毒化——是造成人们对他的写作一贯持纠缠不已的怀疑态度的根源。他仿佛觉得自己被人从法国的哲学舞台流放，而人们却违反常情地以美洲式的“差距”来谴责他，可是早在 1952 年，这差距已经出现。

但是利科的退却并非偶然。他比不少思想家更爱流动与旅行，也更好奇——而这些思想家却曾将流动生活，“差异”理论化——因此，在 68 年以后的大学中，在一个愈来愈屈从于大众传播媒介的节奏的知识界，利科难于找到他的位置。在拒绝任何一种对群众的煽动或任何妥协的情况下，他自然处于批判思想与大学的学院语言之间的中间地位。

双重的现代人

但这是对知识阶层的心理状态或社会状态过分重视。我们要认识利科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必须提出他在哲学领域中的独创性来。这独创性在于采取与法国思想的各种主要倾向双重相反的立场：一方面在打赌对黑格尔的批判并非必然导致怀疑历史行动的可能性本身的同时，这种独创发扬了一种“伦理”，而没有这种伦理，历史将失去任何意义。另一方面，既拒绝打破与现象学的关系又拒绝打破与来源于费希特的反思传统的关系，还拒绝对“结构主义的切割”过分让步，使他得以逐渐建立在《犹如他人的自我》一书中达到完成的“自我的解释现象学”。利科在黑格尔后的历史的及思辨的背景下思考行动的条件，这使他反常地摆脱了最现代的伦理探讨（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也摆脱了外在思想（吉尔·德勒兹）或后现代思潮（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吉雅尼·瓦蒂莫）——同时使他接近于梅洛-庞蒂的传统，自战后以来，这一传统是批判极权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使他接近于一种更新的历史思想。

1975至1985年间，作为出现在哲学舞台的“边缘”的演员，他是对这场演出的可贵的揭示者。首先是他审察对黑格尔及对历史的意义的诉讼所用的独创的方式，诚然，“20世纪的罪行”（扬·帕托卡）搞乱了总的意义及

各种意义，使之无所适从，以致世界上及历史上的关系呈现紊乱状态。意义成为历史祭坛上的牺牲品后，再次成为一种赌注。但是是什么赌注呢？存在主义的、神学的、还是伦理的？虽然人们面对以弗朗兹·勒维纳斯为代表的救世主的思想，面对康德学派对黑格尔的回答，或吉尔·德勒兹一派的反黑格尔的尼采主义所提出的论证表现那么敏锐并持批判态度，势必看到的是这些思想不同却具有一共同点。这些思想在引用法则或一种外在时，在转向一种普遍性，转向他人或特殊性时，它们背离了正出现在眼前的历史——尽管它们之间具有深刻的差异——这就是说背离了一种批判的描述或一种历史的现象学。这一历史被坚决拒绝，因为它代表的是战争、虚假、幌子，它代表的是那么多的指出历史应从别处获得其精神力量的词，这些词指出其力量对于它是“外来的”，并来自“另一世界”（无论按宗教的意义与否）

简言之，在民主社会的“解体化”（托克维尔）引发问题的时刻，这些激烈论战，几乎相互矛盾的思潮却皆承认：历史没有形体，没有意义，或者至少只具法规或伦理自外赋予它的意义。受到过分要求的意义，总是被抓错，总是被过分展出，它退出了历史。即使康德的或伦理的迂回是合理的，也没有任何回归于法规的行动能驱散虚无主义的迷雾与价值的相对主义以及民主所倚仗的意义的的不确定性。利科的长期研究正是在这自相矛盾的气氛中发展的：他与某些在虚无主义与理性之间划分确信无疑的界线的人士相反，他注意当代的虚无主义，

价值观的多神论（马克斯·韦伯）以及民主的不确定性（克洛德·勒福尔）。当“意志作为价值观的起源出现，而世界作为无价值的简单事实退居次要地位时，虚无主义已相距不远”（**CI**，第 453 页）。

但是面对历史进程中行动的可能性，如何避免给予当代怀疑主义太实质的保证？那就是不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先验地排除历史的价值。必须“从头开始再承担起上个世纪黑格尔所承担的辩证哲学的任务，这辩证的哲学在系统的统一性中承受了各各不同层面的经验与现实”（**CI**，第 486 页）。利科在保留黑格尔哲学的深层涵义时，为伦理的场地打下基础，其隐含的雄心是在“目的论”与“道义论”之间编织新的联系，同时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条件进行思考。这促使他通过基尔克加以阅读黑格尔。如果他采用了现代虚无主义的措施，那也是为扭转情况无限期地开凿涵义的园地。在这意义上，利科所放弃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而不是其辩证法的精神。

伦理在利科的哲学中并不混同于康德道德法则的形象，也不像在勒维纳斯思想中那样是被动接受的，而是按亚里士多德的意义指在“法则完成时刻”前的“**I' éthos**”（品性）。“理性是实际的。仅只在我们能将这普遍性的印章应用于我们的欲望，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准则的范围内，某种家族的相似神情，才在历史人与自然人之间显现。... 但是承认这普遍的法则的合理性并无碍于反对任何使立法成为第一步的伦理措施的意图⁰。这从未被利科否认的伦理方法，与斯宾诺莎的“**Conatus**”

(努力) 的思想或莱布尼茨的 “**appétition**” (强烈愿望) 的思想是不可分的, 在利科最近的写作中是以三段式结构的形式表现的, 这种三元型 (对自己与自尊的关注, 对他人与关怀的关注, 对制度与公正制度的关注) 相继在语言、行动、叙述与伦理方面中展开, 并趋于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 伦理并非一种由外在来的慷慨的 “天赋” 为一必然消亡的历史或一道德准则的同等的东西 “赋予意义”。伦理属于历史, 并在历史中发展, 伦理具有一种个别的, 社会的及历史的 “形体性”。¹

然而这样的行动哲学是如何反击当代怀疑主义的呢? 利科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探索仍能容许对行动的可能性有 “信心” 的条件, 对自我, 对他人及对历史有信心的条件。简言之, 相信——按非宗教的意义相信历史仍是可能的。若无这种信心, 历史行动的可能性将完全消失, 同样消失的是许诺的思想, 而没有许诺的思想, 历史将化为乌有, 我们作为没有绝对知识可依靠的孤儿, 比任何时候更不应放弃历史。

在观念与经历之间

如果说利科的雄心是建立一种不放弃辩证精神的行动的 “现象学”, 那么他拒绝与现象学思潮断绝关系的行动就使他能完成这一计划。

由于他的收集在 《向现象学学习》² 一书中的翻译文章, 利科立即响应并支持了现象学在法国的飞跃发展。

但是他与许多同时代人的大不相同点是，他没有在 50 年代末与 60 年代初疏远现象学思潮，如不少哲学家当时的情况那样，那时他们拜倒在人文科学的魅力下并参与了对哲学的埋葬³。而且虽然在某些时期他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演变提出异议，但是他一贯承认而且最近也仍然承认受益于现象学。在 1990 年，“现象学”这个词仍然明确地出现在其著作《犹如他人的自我》中。

如何解释这种忠诚呢？从利科有关胡塞尔研究的文章中很快即可看出分晓：现象学为利科勾勒出“真正问题的轮廓”。对这一问题，他是这样表示的：“如何避开笛卡尔被休谟再解释的唯我主义，以求认真看待文化的历史框架，以及文化培养人的真正力量？如何在同时避免落入黑格尔的一种绝对历史的陷阱？这种绝对历史被推崇到无异于外在的神明的地位？”⁴现象学在历史上的出现发生在一种思想范畴内——利科在一篇为唐迪道 (**Tsan Duc Thao**) 的著作《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⁵所写的文章中提到这一点——这样的思想范畴只能“以它的局限为依据”：“人们能考虑的是，现象学为建立其本身的权力以求庄严地统辖所出现的事物的王国，是否不要求一种对所出现的事物的批判⁶”。这种对现象学的矛盾所作的评价——现象学游移在一条倒退的道路与一条前进的道路之间，前者“解散物体”并在时间性膨胀的代价下描绘出实际经验的消长，后者则突出在世界的构建中超验的自我的作用——使利科能恰如其分地估价胡塞尔的理想主义的批判，并不将对主体哲学的揭露与哲学

本身混淆。

再者他拒绝与胡塞尔的哲学遗产破裂是不向概念的诱惑让步的行动，或者至少是不向可称为概念及外在思想在法国的霸权低头的行动：这些外在的思想早在50年代末就激烈地摆脱当时更集中在对感性与实际经验的思考而不是集中在超验的建立。在法国，这种强调在概念与感性之间进行的认识论的割裂是千变万化且难于阐明的：概念的雄心在于严格划出思辨语言的界限以反对来自现象学的可能歪曲，但在这样的思维下，它促使哲学研究接近于科学的历史，接近于逻辑学以及沿袭让·卡瓦伊热的学术遗产的认识论（卡瓦伊热的继承者有让·图森·德桑蒂，苏姗·巴什拉）。在一定方式上黑格尔与胡塞尔的双重批判达到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反常地适合于某些性质极其不同的思想。

但是对概念的过高估计造成一种转移：如果说概念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对立是合理的，并制约科学语言或思辨语言的可能性，那么当这种对立被强制作为绝对规则并广泛用于最不相同的各个领域时，这种对立就是很可争议的了。这样的普遍化促使一种经常可概述为一种方法论的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出现。而这种意识形态并未对其所记录的意义、历史及主体的三重消亡作出足够的考虑¹。要摆脱具有胡塞尔意识的理想主义及几乎所有带“主义”字样的思想意志并非没有招致严重的后果。在由敌对的三兄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所形成的奇特的在法国本土的三足鼎立”的背景下，“结

构主义带来的是一种按照系统概念而非按照历史概念的思想，建立确定差异的整体的思想，尤其是一种认为不要求任何主体对任何东西赋予意义的思想”。⁸

如果说利科坚持哲学言语与隐喻言语相比所具有的自律，那么，他拒绝退让，拒绝或是向基本的本体论（海德格尔）撤退，或是向唯有的认识论言语撤退。因此，他的愿望是将他称为“不完善的中介”的东西，将被表现为辩证的努力，表现为一种趋向的东西搬上舞台。而没有这种趋向，实际经历与概念的分裂就更突出而有损人类学的对不同方面的经验分析。正逢当代思想（康德派，黑格尔派，尼采派）挥动概念（或普遍的规范）以反对感性、史实性并突出以 **doxa**（主张）、意见为一方，以认识、知识为另一方的对立时，利科制定的是“未完成的辩证法”的措辞，重视介于“**doxa**”（主张）与“**l' épistémé**”（认识）介于“短暂而偶然的感受与稳定必要的科学之间的中间空间。换言之，即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恰好相应，并表示正直意见的范围的 **doxasein**（舆论）的领域，而这正直意见的范围并不与 **La doxa**（意见）也不与 **l' épistémé**（认识）相混同，而是与可能的及似确有的合在一起。因为可能的具有某种程度的确实性及稳定性，因此表现出与真实的相似。可能的即似确有的，这是大多数人或大多数最聪明的人所形成的意见，这些意见介于必然的真实与明确的虚假之间⁹。

这就是利科哲学旅程的主要独创性：利科从黑格尔的批判中保留了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相呼应的未完成